

## 專題引言：

日本學者追求「觀念史」研究的  
固有歷史脈絡與三個契機

# Special Issue: Three Momentums in the Japanese Context of Research of Chinese Thought with the History of Ideas Methodology

佐藤將之\*

《東亞觀念史集刊》本期的專題是「日本學者之中國思想研究中的觀念史（古代篇）」。按照過去本刊專題的慣例，身為本專題的策劃人，筆者的任務就是闡述本專題的緣起、目標、內容特色以及對未來此研究領域的可能貢獻。整體而言，日本學者對中國哲學、中國思想史相關主題的研究，除直到最近十年左右的近現代思想史的部分之外，基本上與日本國外的所謂「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脈絡獨立進行。因此，如下所述，雖然在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中（按：

---

\* 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所涵蓋的「古代」範圍為先秦到兩漢時期）可以觀察出廣義的「觀念史」研究手法，而且其歷史也相當悠久，但其發展過程基本上均獨立於1930到80年代在歐美崛起而流行的研究潮流之外：如美國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在二十世紀中期所開展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sup>1</sup> 稍後（即1960年代後）由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等學者主要在德國一步步累積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 History of Concept）研究，<sup>2</sup> 以及在英國曾經由威廉（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所推動的「關鍵詞（keywords）」計畫等。<sup>3</sup> 也就是說，在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研究著作中，筆者尚未找出任何直接引進如上歐美的「觀念史／概念史／關鍵詞」研究的痕跡。

關於在今日所稱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日本學者提及釐清「概念」的重要者，有由後來成為著名日本法制史研究者的三浦周行（1871-1931）在年輕時——即在1904年（明治37年）——發表的〈專門學に於ける概念の必要〉一文。三浦在此文中將學術研究的「概念」以一般生活中的「常識」來比喻，也明確指出「概念」是在

---

<sup>1</sup> 這裡所界定的「觀念史」應該可以借用本刊主編鄭文惠的理解為合適。鄭文惠說：「諾夫喬伊認為觀念是在認識世界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觀念構成思想的基本要素，而積存於人類思想的底層；思想以一種結構化的觀念系統存在著，可分解為諸多單位觀念（unit-ideas）與觀念叢（unit-complexes），每一種觀念是由各種相互關聯的單元觀念組成，而單位觀念也是許多觀念的複合物。諾夫喬伊研究諸觀念的複合物的歷史，注重觀念的歷史起源、演變，及其作用與影響；觀念得以產生、變化、影響的心理學特徵；觀念群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原則之間的聯繫。」請參閱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229。

<sup>2</sup> 關於所謂主要曾經在美國推行的「觀念史」研究和歐陸（主要在德國）進行的「概念史」之間的關係，請參閱李謝德（Melvin Richter）論文：Melvin Richter, “Begriffsgeschicht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8, no. 2 (Apr. - Jun., 1987), 247-263。

<sup>3</sup> 此計畫的成果結晶為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75)。此計畫在威廉去世後繼續由 Tony Bennett 等進行的「改訂版」在2005年出版。

經過歷史過程而形成具有複雜的涵義。<sup>4</sup> 其實，三浦曾經出版過《國民思想動搖期に於ける國體觀念の歴史的發達》一書。雖然這一本的實際內容為闡述在日本武士政權時期「天皇」的政治權力和角色相關的問題，不過三浦在其書名中明確使用「觀念」、「發達」等術語，也許我們可以將三浦周行看作在日本人文學術研究發展的歷史中明確意識到「概念」和「觀念」的重要之先驅者。<sup>5</sup> 不過，關於如三浦周行等主要在明治晚年受教育，而在大正時期（1912-1926）活動的歷史學家對「概念史」或「觀念史」研究方法的推行和發展發揮的具體情形尚待進一步釐清。

直到1960年代，在所謂「東洋思想史」領域的日本學者中第一位明確提及所謂「觀念史研究方法」者，應該以丸山眞男（1914-1996）為嚆矢。丸山在1963年出版的〈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範圍、對象〉一文中，將到1960年代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分成（一）「教義史」（History of Doctrine）；（二）「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以及（三）「（時代）精神史」（Zeitgeist）等三條脈絡。在丸山對「觀念史」研究的說明中，舉出諾夫喬伊和他所主宰的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觀念史學刊》）的活動。<sup>6</sup> 在該文中，丸山接著對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舉九鬼周造（1888-1941）在1930年出版的《「粹」的構造》一書為例，並且將之視為由此研究途徑來撰寫的代表成果。<sup>7</sup>

<sup>4</sup> 三浦周行：〈專門學に於ける概念の必要〉，《國學院雜誌》，第10卷1號，1904年，頁13-21。

<sup>5</sup> 三浦周行：《國民思想動搖期に於ける國體觀念の歴史的發達》（京都：京都國文社印刷所，1901年）。按照日本國會圖書館的藏書紀錄，三浦直到其晚年的1929年、1932年自費出版。

<sup>6</sup> 丸山眞男：〈思想史の考え方について——類型、範圍、對象〉，收於武田清子編：《思想史の方法と對象：日本と西歐》（東京：創文社，1963年），頁3-33。丸山眞男著，區建英譯：〈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範圍、對象〉，收於丸山眞男著，區建英譯：《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頁176-193。

<sup>7</sup> 丸山眞男：〈思想史の考え方について——類型、範圍、對象〉，頁6-8；

至於丸山本人的研究，在所謂「丸山後期」（1970年代後）時段的研究中，他似乎採用與他自己在〈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一文曾經界定為「觀念史」方法相吻合的分析手法來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思想，並且提出了在日本思想研究史上相當著名的所謂「日本思想之『古層』」的理解架構。丸山在他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等日本古代歷史書的內容中關注「なる（生成）」、「つぎ（接承）」及「いきおひ（勢力：生生不息的力量）」的三種觀念，並且主張這三個概念構成了日本思想中的「基底範疇」。在此理論假設下，丸山探討此三種概念的展開；此概念的展開過程就相當於成為丸山所稱的日本思想之「基底低音」（原文為「持續低音（basso ostinato）」）的歷史過程。丸山對「なる」、「つぎ」以及「いきおひ」三個觀念的分析基本上是在日本思想史脈絡中進行的，但關於「いきおひ」一詞，因為通常以漢字之「勢」字來訓讀（如當代日語中的「いきおい」寫成「勢い」），丸山還強調「いきおひ」的涵義與漢字的「勢」字之涵義不甚相同。<sup>8</sup> 不過整體而言，九鬼周造的「粹」觀念研究也好，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的古層論」也好，都是在日本思想研究的脈絡中進行，基本上沒有提及中國思想史上的相關問題。<sup>9</sup>

相形之下，日本學者對（古代）中國思想研究中則很少有如丸山

---

中譯本，頁178-180。九鬼周造：《いきの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30年）。中譯本為九鬼周造著，藤田正勝原註，黃文宏、黃錦容、內山康譯註：《「粹」的構造》（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

<sup>8</sup> 丸山真男：〈歷史意識の「古層」〉，收於《日本の思想》卷6（「歷史思想集」解說）（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後收於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轉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東京：筑摩書房，1992年），頁321-333。

<sup>9</sup> 丸山真男：〈歷史意識の「古層」〉，頁293-351。田口富久治觀察出：丸山の「古層論」の出發點是他對日本近代政治運作——「無責任的體系」的疑問。請參見田口富久治：〈丸山真男の「古層論」と加藤周一の「土着世界觀」〉，《立命館大学・政策科学》第9卷第2號（2002年1月），後收於氏著：《丸山真男とマルクスのはざまで》（東京：日本評論出版社，2005年）。

的研究明確引進如上所述歐美的「觀念史」、「概念史」以及「關鍵詞史」的研究方法者。不但如此，其研究甚至是幾乎完全獨立於日本思想史研究中「觀念史」方法的脈絡外進行。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從中文學界的視野來看日本的中國思想研究相關著作，卻有許多「觀念史」研究相關的研究之印象——例如：小野澤精一等學者合力推行的「氣」概念研究計畫；<sup>10</sup> 由溝口雄三（1932-2010）等東亞思想歷史的每一位參與者各提供一本專書而構成的「一個字的辭典」（一語の辭典）叢書，<sup>11</sup> 直到最近從法政大學出版會開始出版的「由觀念詞來閱讀中國古典」系列（シリーズ・キーワードで讀む中國古典）等。<sup>12</sup> 的確，在日本的中國思想研究歷史和脈絡本身也存在著讓國內外學者覺得日本學者的研究重視「觀念史」研究方法的原因。

由是觀之，假設我們在日本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將「觀念字」為主要分析單位的研究方法可以暫稱為「觀念史」方法，而且從

<sup>10</sup> 小野澤精一等編：《氣の思想：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觀と人間觀の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中譯本為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念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也請參閱本專題中竹田健二的專文（頁23-60）。

<sup>11</sup> 此叢書由三省堂從1995年至2001年出版，不過按照該出版社的官網，全部都絕版。以下為其觀念詞、作者以及出版年度。柳父章「文化」（1995）、相良亨「心」（1995）、飯田賢一「技術」（1995）、小田亮「性」（1996）、野口武彦「小説」（1996）、佐藤喜代治「氣」（1996）、阪倉篤義・淺見徹「家」（1996）、平石直昭「天」（1996）、樋口陽一「人權」（1996）、作田啓一「個人」（1996）、源了圓「義理」（1996）、一海知義「風」（1995）、溝口雄三「公私」（1996）、大野晋「神」（1997）、中山千夏「おんな（女）」（1997）、阿辻哲次「文字」（1998）、石田雄「自治」（1998）、野崎昭弘「一（いち）」（1998）、伊東俊太郎「自然」（1999）、柳父章「愛」（2001）。其中，「心」、「氣」、「天」、「義理」、「風」、「公私」以及「自然」含有在中國思想中的相關用例之說明。其中專攻漢學領域的有兩位：溝口雄三和一海知義，前者為中國思想，後者則是中國文學。

<sup>12</sup> 各卷的編者和主題如下：第1卷・中島隆博：《コスモロギア—天・化・時》（2015）；第2卷・廣瀬玲子：《人ならぬもの—一鬼・禽獸・石》（2015）；第3卷・志野好伸：《聖と狂—聖人・真人・狂者》（2016）；第4卷・齋藤希史：《あらわれのアルス—志・情・意》（待刊）；第5卷・伊東貴之：《治乱のヒストリア—夷狄・正統・勢》（2017）。

廣義上都可以找出與如上「觀念史」、「概念史」或「關鍵詞史」研究方法共通之處，我們也許可以說，廣義而言，在日本中國古代思想研究的歷史中「觀念史」研究方法應該存在著，而且，如下所述，日本的古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實踐「觀念史」方法也應該是從明治中期開始，迄今可以算擁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在此不算短的歷史過程中，其研究手法、觀點以及對整體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角色也隨著時代而轉變，並且形成了日本學術發展脈絡中固有的脈絡。因此，假設本文成功地闡述日本這樣的固有研究脈絡，便能顯現出與歐美進行的「觀念史」、「概念史」或「關鍵詞史」研究不同的特質之處。鑑於此，下文中筆者欲闡述在日本學者對中國（尤其是古代）思想史的（廣義的）「觀念史」研究方法的發展，藉關注其意義比較大的三個契機，來呈現日本「觀念史」研究的固有脈絡。

首先，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之「觀念史」方法的「第一契機」可以溯及德川時代中期的十八世紀初。在這裡，若我們設想：在敘述西方學術界對「概念史」或「觀念史」研究的淵源在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歷史哲學》中的“*begriffsgeschichte*”一詞出現的話，與其類似的意義上，在日本學術傳統中對「觀念史」研究方法之淵源也許可以溯到荻生徂徠（1666-1728）《辨名》<sup>13</sup>一書中所呈現出荻生徂徠對闡述思想的態度。不可諱言，《辨名》與《辨道》一書相搭配，構成荻生徂徠自許最爲核心的代表作品。不過乍看之下，黑格爾和荻生徂徠之間這樣的對比會讓讀者不禁覺得兩件事情是「不可對比（*incommensurable*）」的。然而，在筆者眼中荻生徂徠《辨名》的提出，就像明治時代以後的東洋哲學史家、思想史家在中國古代思想「研究」領域，日本學者嗜好「觀念史」（正確地說應該

---

<sup>13</sup> 關於荻生徂徠《辨名》過去出版的註解、評論、當代日文翻譯、以及相關研究著作的數量非常多，本文只列出河出書房新社「全集」中的譯注出版訊息。荻生徂徠：《辨名》，收於今中寬司等編：《荻生徂徠全集》第1卷（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年）。

要稱爲「觀念字／詞史」)研究的先驅性意義。依筆者來看,《辨名》一書對其後日本中國思想研究中「觀念史」研究方法的意義可以分成兩點:第一,雖然荻生徂徠著寫《辨名》的目的並非如黑格爾般建構「哲學的歷史」,而在於正確闡明古代聖王所制定的理想國制——即「詩書禮樂」的真實面貌,但徂徠在《辨名》所做的方式,竟然與威廉的關鍵詞計畫一樣,選出了多達75個(上卷40個;下卷35個)「關鍵詞」來試圖闡述先王所提出的理想政治制度和倫理的藍圖。即便在爲了先王的理想政治和倫理世界的闡述中,也採取闡述其理想的核心內涵——即「道」和「德」的釐清,以及對其最核心的文獻——孔子的《論語》做了註解(《論語徵》的撰寫),而這是朱熹以來典型思想闡述的主要方法。但荻生徂徠進一步認爲,爲了理解在古代的理想政治,學者需要梳理一套構成古代言論之關鍵詞群之語意的必要。這樣的態度與當今人文學術中所進行的「觀念詞計畫」的思維相當接近。<sup>14</sup>第二,荻生徂徠在《辨名》的序言中主張:「今言非古言」,也說:「自厥以降世,載言以移」。他的意思是,語意經過歷史就必然受到不同時代所進行的論辯影響而變遷。這點也是與觀念史的想法完全一致。<sup>15</sup>

第二個契機是出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即在明治維新之後引進西方學術的期間。與本主題相關而筆者所關注的人物是井上哲次郎

<sup>14</sup> 威廉即說:“This is not a neutral review of meanings. It is an exploration of the vocabulary of a crucial are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iscussion, which has been inherited within precis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and which has to be made at once conscious and critical subject to change as well as to continuity.”見 Raymond Williams, “Introduction,”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4.

<sup>15</sup> 在此意涵上,荻生徂徠的《譯文筌蹄》(第1卷爲1715年出版)的撰寫是爲了釐清古代聖人的語言要理解的詞彙之範圍之一種「無限擴大」。不過,耐人尋味的是《譯文筌蹄》的出版竟引起了當時德川知識分子對當代中文的「學習熱」。請參閱武內真弓:〈荻生徂徠の言語觀—『訳文筌蹄』初編と「国会本」の比較から〉,《中国言語文化研究》第14號(2014年8月),頁1-18。

(1856-1944)。<sup>16</sup> 眾所周知，井上哲次郎從明治中期直到昭和初期奠定整個日本東亞哲學研究的方向，也可以說，他「創造」了「佛教哲學」、「神道」、「武士道」、「國民道德」等研究領域。將德川時代儒家思想的脈絡首次分爲「朱子學」、「陽明學」以及「古學」等三學派的學者亦是井上哲次郎。只不過在這裡筆者只點出井上哲次郎對之後日本中國思想研究中廣義的「觀念史」方法發展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1881年《哲學字彙》的出版。<sup>17</sup> 如其名稱所示，《哲學字彙》是今日意義上的「哲學術語字典」。井上認爲當時在西方學術的引進上，對每一個術語有許多翻譯語亂立的狀況需要克服。於是如其序文說：「此書據迎人弗列冥氏哲學字典而起稿」，他根據弗列冥（William Fleming，1791-1866）的《哲學用語集》爲底本，<sup>18</sup> 不過因爲「該書不多載近世之字」，在編輯之際，井上他們還「徧搜索諸書所增加甚多」。該書付梓後頗受歡迎，不久就銷售一空，於是在1883年出版修訂版（第二版）。因爲井上本人已赴德國，由有賀長雄（1860-1921）負責印刷。爾後，井上回國後的1912年，項目中也俱列德語和法語詞的第三版出版，書名也調整爲《英獨佛和哲學字彙》。《哲學字彙》所載錄的術語數量也從第一版的1,951個、第二版的2,723個，至第三版的10,419個一直增多。<sup>19</sup> 本文並不贅述《哲學

<sup>16</sup> 井上是明治初年創立不久的東京大學哲學科的第一屆畢業生（1880）。畢業後先服務於文部省御用掛和編輯局兼官立學務局，並從事「東洋哲學史」之編輯。從1884年至1890年留居德英法三國。回國後就任帝國大學哲學科教授。

<sup>17</sup> 如下文所述，《哲學字彙》經過三次不同的版本之出版。名著普及會在1980年也出版將三種版本合成一冊的「覆刻本」。除此之外，目前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等網站提供其全文照片的電子檔服務。

<sup>18</sup> William Fleming, *The Vocabulary of Philosophy, Mental, Moral, and Metaphysical, with Quota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London and Glasgow: Richard Graffin and Company)。1957年初版、1858年第二版、1860年第三版，以及1887年第四版。第二版以下的出版地和出版商與第一版不同。

<sup>19</sup> 飛田良文：〈『哲學字彙』の成立と改訂について〉，《英独仏和哲学字彙・覆刻版》（東京：名著普及會，1980年），頁1-16。



字彙》的內容和其出版的整體意義，筆者關注的是，在第一版出版的當時，身為「哲學」學科第一屆畢業的一個青年所想到的就是要釐清在哲學領域相關的術語之涵義，並且找出日語中與此相當（井上說“equivalent”）的術語，<sup>20</sup>或甚至創造新的術語。井上相信，構成整體西方知識體系的詞彙之釐清以及將之由日文相類的名稱來界定，就是當時日本受到新制近代教育而屬新世代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值得注意的是，井上這樣對為哲學研究而界定「觀念詞」的追求，正與於他兩百年前的荻生徂徠為理解古代聖人的「經典體系」要釐清儒學中的主要德目（＝觀念詞）之態度相當吻合。

第二件事情是井上哲次郎在年輕時有發表由廣義的「觀念史」研究方法撰寫中國哲學史相關主題的論文之事實。在井上從總共六年的留歐生活回來之前一年的1889年，他參加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萬國東洋學會時，以德文發表論文“Die Streitfrag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en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sup>21</sup>此文也可以說是身為「東洋哲學專家·井上哲次郎」在歐洲學界的「出道」作品。井上在回國後不久的1891年將該文的日語版以〈性善惡論〉為題目，分兩次（第47號及第48號）由《哲學會雜誌》出版。<sup>22</sup>從其題目看就瞭然，井上並沒有選擇某個思想家或某段時代的思潮，而是關注中國哲學上「性」觀念的展開。在其文開頭，井上開宗明義說明中國思想中的「性」概念為何重要。他說：

<sup>20</sup> 第三版的「序言（Preface）」井上說：“One and the same term had sometimes been translated by various expressions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quite distinct in their signification by readers unacquainted with original. It was, therefore, very necessary to settle finally the Japanese equivalents of the European technical terms.”

<sup>21</sup> 島蘭進、高橋原、磯前順一：〈解說〉，收於島蘭進編：《井上哲次郎集》第9卷（東京：クレス出版，2003年），頁21。此冊也收錄井上的德文版原文（同書，頁426-434）。

<sup>22</sup> 井上哲次郎：〈性善惡論〉，見島蘭進編：《井上哲次郎集》第9卷，頁57-85。

在支那哲學中人性原善或原惡之問題是極為重要的，而從孟荀之時降及趙宋之儒家幾乎沒有不論及此問題者。這就是因為支那哲學的主旨在於解說倫理道義，而倫理道義之教育內容由「性」之善或惡之觀點而有大大不同。

此篇所涵蓋的時代範圍相當長：井上哲次郎蒐集了從先秦時代的經書到南宋時代的朱熹有關「性」的言論，而這樣的研究手法可以與如上所提及諾夫喬伊的名著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探討“being”觀念展開的論述相比。<sup>23</sup> 我們稍微檢驗荀子「性惡」部分的論述，井上說：

荀子……提倡性惡之說，站在與孟子完全相反的地位，《荀子》之言「人之性惡其善偽也」。按此言，「惡」是人之本性，其「善」者因人爲而矯正之故。<sup>24</sup>

如上引文中，先會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雖然井上哲次郎在年少時還在德川經學傳統環境接受閱讀漢籍的訓練，而且井上本人對儒家倫理的價值相當認同，但至少在他的「性」論考察中並沒有呈現對孟子的偏向或對荀子的嫌惡，而保持對不同思想家的「性」概念比較客觀的態度。其實，如上引述段落中的論述重點並不在於個別思想的闡述，如《荀子》「性惡論」的內容本身；而在於釐清孟子、告子以及荀子等幾種「性論」相關的學說在和西方哲學比較時該如何歸類的問題。他指出：荀子的「性惡」，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思想相類似。井上在通觀中國哲學一千多年歷史中的「性」論演變後，總結

<sup>23</sup> 此書在1936年由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初版。中文翻譯，請參照諾夫喬伊著，張傳有、高秉江譯，鄧曉芒、張傳有校：《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sup>24</sup> 井上哲次郎：〈孝道觀念の變遷に就いて〉，《丁酉倫理會倫理講演集》第3號（1909年7月），頁102-103。

說，歷代「性說」可分成「唯一」(Monismus)、「俱有」(Dualismus)以及「俱無」(Nihilismus)，他將孔孟荀的「性說」都歸類於「唯一」的思想特色。其實，在之後井上討論思想問題時繼續保持「觀念史」研究方法。井上在此文將近二十年後的1909年所發表的〈孝道觀念の変遷に就いて〉中，正如題目中的「變遷」所示，關注「孝」概念所界定的含意是隨著時代而演變的。<sup>25</sup>

我們要看的第三契機是在1930-40年代，其場所在以津田左右吉(1873-1961)為核心的中國思想史之研究班，尤其在津田的弟子栗田直躬(1903-1998)的思想研究方法中觀察到的。如前所述的丸山眞男在1952年出版，亦是丸山的第一本專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後記」中說，津田左右吉的研究對他的思想史研究有了啟發。<sup>26</sup>關於栗田直躬的「觀念史」研究的具體內容，本專題中草野友子的論文有述及，故在此不贅述。在這裡則透過栗田的老師津田左右吉在栗田的代表研究著作《中國上代思想の研究》的序文中，花了幾乎三頁說明栗田的研究方法並介紹來理解當時——即1930-40年代——日本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觀念史」方法被引進的情形。<sup>27</sup>無可諱言，這段文字同時也說明津田本人研究思想史的方法之特質。

在其序文中，首先津田指出，以考證為主的傳統文本研究很難以釐清古代思想的實際面貌。津田認為：要釐清某個思想當然要了解其語言文字的意義，但為了釐清某個文本語言文字的意義，也同時要了解由此呈現的思想內容，而過去傳統註解家的思想研究一直免不了(一)按照某個意義來說明所有的例子；(二)無條件地採用前人的說法來說明，以及(三)根據後世的理解框架來解釋前面時代的思想。津田肯定說：栗田的分析手法有助於克服如上傳統註解方式進行的思

<sup>25</sup> 井上哲次郎：〈孝道觀念の変遷に就いて〉，《丁酉倫理会倫理講演集》第3號(1909年7月)，頁102-103。

<sup>26</sup> 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

<sup>27</sup> 津田左右吉：〈序〉，收於栗田直躬：《中國上代思想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9年)，頁1-3。下文則為整理此三頁津田的論述。

想研究之缺點。津田將栗田的研究方法綜理成兩部分：其一，針對詞語本身的考察，以及其二，詞語與其文脈之間的關係之探析。

首先針對詞語本身，栗田的分析重視：（一）詞語在句子結構上的文法機能（因為中文的詞語沒有具有英文的機能語，如英文的“-ed”、“-ing”等）；（二）構成連詞時的結合狀態和對稱的方式；（三）修辭的方式與習慣、描述和形容功能上之語感，以及反覆使用的情形；以及（四）作者使用此語的心理和讀者對此語的感受。栗田批判從某一個語詞的涵義要直接由字型或「原義」演繹的解釋方式，因而也懷疑《說文解字》解釋方式的效果。

那麼詞語和論述或詞語和文本之間的關係如何探析呢？根據津田的綜理：栗田的方法先設定問題，並選擇與此相關的關鍵詞語在相關文獻中全面蒐集其詞語的全部用例。若精查這些用例便能發現，在不同用例之間，各個詞彙之間的用法之不同，或其語義的不同；接著，按照其用例上的特色分類個別用例，而至此，分析者通常會有對不同類型之間為什麼產生彼此之間的差別之疑問；於是會進一步確認在兩個同字有不同涵義的情況之理由，應該在於兩者之間產生語義轉化的結果，而根據此理解，將很多用例的不同類型歸納出各個代表其歷史變化之系列。還有可能的原因是，作者的差別，或者不同作者對詞語的思維或態度之不同所致，並且將這樣歸納出的思想特點，可以與某個學者或學派的思想傾向、使用此詞語的典籍的思想傾向相對照。在推測某個詞語的歷史變化過程之際，從原義或已經受變化的情形而推測彼此前後之間的轉化，並要觀察這樣的轉化是否代表此詞語的變化之「簡化」或「複雜化」，或者加上或除去何種成分。這樣的觀察必然會導致我們進一步思考某個概念轉化的過程是否受到學派或典籍的思想傾向影響的問題。要辨別出某個詞語之轉換過程會產生不同思想或典籍之間的差別的問題意識，從而引導出對學派和典籍的歷史變化的探析。從這樣的分析我們也觀察到，在產生如上差別之背後還有共通的思想成分之可能性。

以上為津田左右吉對弟子栗田直躬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說明。其實，津田本人對栗田研究方法的評述只使用日語的「語（ご）」或「用語（ようご）」，而未出現「觀念」或「概念」等術語。然而若我們只要將「語」或「用語」換成「觀念」或“unit-idea”的話，就會發現這樣的研究方法，與上文引用的鄭文惠整理諾夫喬伊之分析手法幾乎不謀而合。筆者再引述：「諾夫喬伊研究諸觀念的複合物的歷史，注重觀念的歷史起源、演變，及其作用與影響；觀念得以產生、變化、影響的心理學特徵；觀念群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原則之間的聯繫。」<sup>28</sup> 一般而言，針對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論者比較多提及其「疑古」、「高等文獻批判」等比較顯眼的部分，並傾向於將津田看作過於重視「思想史發展假設」，而比較忽略文本固有的意義之學者；從如上津田所陳述的內容我們能夠理解，津田相當重視嚴密的「語詞分析」（也可以稱上廣義的「觀念史」）的研究方法。在日本古代中國思想的研究者中，津田的直傳弟子並不多，除如上所述的栗田直躬之外，對目前學界仍有影響的學者有：研究墨家思想的渡邊卓（1912-1971）、道家思想的楠山春樹（1922-2011）等。不過，如上所述津田和栗田在1930-40年代所推行的廣義的「觀念史」研究方法，也與當時摸索類似津田的研究方法的加藤常賢（1894-1978）對「禮」概念的研究、竹內照夫（1910-1982）對「仁」概念的研究、石黑俊逸（1914-?）的「性」概念的研究等成果合流，成爲了日本古代思想研究的主要分析手法之一。

前文說明日本學者對東亞思想史研究上的「觀念史」研究之當今情況，以及對其展開可能有過影響的三個契機。下面則將介紹筆者對籌策本期專題內容的構想和本期所收錄論文的一些特色。

首先，假設若我們關注本期所收錄的八篇論文和如上所述的「觀念史」研究方法之間的關係，其實，本期所收錄的八篇論文，包括筆

---

<sup>28</sup> 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頁229。

者自己的論文在內，並沒有直接提出針對如上所述的「觀念／概念／關鍵詞」史的脈絡。其中，作者自己方法論上的觀點，也沒有提出對其偏好或嫌疑的立場。這樣的情形也許會異於讀者對本專題本來所具有的期待。不過，在為本專題提供論文的作者中，至少四十歲至五十多歲的中堅學者在他們作為研究生時代都曾經接觸到如上筆者所介紹的「津田左右吉—栗田直躬」脈絡的「觀念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研究脈絡中產出對中國古代思想中主要觀念的個別研究著作之影響和啟發。前者筆者已在本文前面提供概括性的說明；而後者則是在草野友子的論文中有詳細的介紹。草野的〈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思想之重要概念的研究特色——以心、神、仁、禮、性命為例〉一文詳述栗田直躬、加藤常賢、竹內照夫以及森三樹三郎等四位在1930-1960年代所進行的「觀念史」研究之主要內容。他們的著作都對當今日本相關領域的學者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透過本「導言」和草野的論文互相搭配，能夠提供針對日本（廣義的）「觀念史」研究的淵源和直接來源，並且說明如何落實於個別研究著作中。也因此，由此兩篇勾勒出日本觀念史研究的淵源、歷史背景以及在二十世紀中期具體展開的情形，實為構成對本期其他七篇論文的「共通序論」。

除了草野的論文之外的其他七篇，都是針對中國古代思想中某個概念的個別研究，包含有「氣」（竹田）、「明主」和「聖人」（青山）、「忠」（佐藤）、「秦」（工藤）、「恥」（中村）、「情」（橋本）以及「天」（菅本）八種。其中，「氣」、「忠」、「情」以及「天」概念的論文都是根據此四位作者經過十年以上、甚至長達二十年以上研究之基礎上而為本專題提供的。青山大介近年關注「聖人」觀念而出版一系列的論考，而本篇自然在他的系列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工藤對「秦」論和中村對「恥」概念的論考則是為了本專題特別撰寫的。除工藤對「秦」的論考之外，其他作者均是從先秦時代的觀念中取材。

其實，本專題所收錄的論文還有一個「共通」的特色，是筆者要特別說明的。此「共通性」與作者們對「戰國楚竹簡」文獻群的關注

和利用這些「新」資料的態度有關。回顧起來，在1998年「郭店楚簡」的公布，使得日本學界過去累積的「先秦思想史」或「先秦思想文獻」發展的說明模式陷入於幾乎不可恢復的窮境。在此之前日本學界對中國古代思想發展的主流觀點是，就像「《禮記·緇衣》代表西漢時代的思想」的見解為代表，有將許多文獻的成篇年代拉到秦漢時代的傾向。而且因為「觀念史」方法主要是由於當時屬「疑古立場」的津田左右吉和引進津田觀點的學者們所採用，主要被用於導出「某某思想的形成其實晚至秦漢……」的結論。在「郭店楚簡」公布時，雖然津田的下一代學者們都早已逝世或退休，但當時日本以「觀念史」為其主要研究的學者在面對屬於「戰國早中期」的「新」文獻群時，不得不放棄過去對中國思想史發展整體脈絡之理解，因而幾乎陷入了一種「精神錯亂（anomie）」的狀態。因此，當時已屆資深的學者們，若不是「假裝」視楚簡為不存在，就是強辯它屬於戰國末年以後的文獻。<sup>29</sup>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一一列舉敘述當時資深的日本學者對自己的思想史理解面對被淘汰的「恐慌」心理，而只在於指出「郭店楚簡」公布以來十多年的日本學界為了將「新的資料」如何配合於自己或日本學界已建立的理解模式而一直掙扎的事實。重點是，由於新的楚簡資料不斷增加的趨勢，乃引起了日本中文學界中「考古學」、「文字學」、「聲韻學」等領域的盛行，也促進了古代思想研究者向「傳統訓詁」方法的回歸潮。相對地，因為「新出土文獻」的研究對「思想」本身的解讀，在程序上處於文字隸定之後，作為思想史研究的「觀念史」方法也必然退居到「第二序」的層次。因此只靠文字學或傳統訓詁方法來解釋竹簡文獻思想的著作氾濫於學界，反而主要任務在於釐清宏觀思想脈絡的「觀念史」研究方法則被迫退到中國古代思想研究

<sup>29</sup> 淺野裕一在許多文章中有時很尖銳地，有時也很幽默地敘述當時的資深學者面對新的研究趨勢很狼狽的狀況。請參見淺野裕一撰，佐藤將之監譯：《戰國楚簡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

的後面去。由是觀之，從「郭店楚簡」公布之後的十幾年期間，不但對日本古代中國思想研究者是嚴峻考驗的時期，而且也讓作為「中國古代思想」主要研究方法之「觀念史」進入了「忍耐」時期。

如此，為本專題提供論文的作者們皆經過如上所述對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思想超過十五年的「逆境」。這樣的經驗帶給了本專題所收錄的大部分論文之間共同的探討方式：本專題的作者大部分是身為津田以來「觀念史」研究方法的繼承人，對如津田敘述栗田的方法論般，將思想的解讀與傳統考據或傳統訓詁區分開來進行研究。因此，此解釋思想的作法還是異於目前中國和臺灣學界所採取的主流思想研究作法：譬如將「考據好」的文獻內容之理解，直接與某部文獻可能的「作者」（如〈中庸〉和子思）、某種哲學框架，或歷史背景的說明結合起來。但又沒有像前一代的日本學者執著於按照原來心裡所具有的思想史發展模式來說明新出土文獻中所出現文字內容的思想意義。反言之，本專題全部的作者先將「戰國楚簡」文獻群看作戰國早中期思想的文獻，而在此前提上試圖提出他們對中國古代思想史某個層面或議題的新理解。在1998年「郭店楚簡」公布以來，經過十多年的「精神錯亂」狀態和掙扎，下一代日本學者——即本專題的作者們——終於可以自然地接受將戰國楚竹簡資料看作為了建構戰國時代早中期的核心資料群。

不過，到此筆者須要再次補充說明的一點是，本專題作者們的主要論述目標，不像在中國大陸學界的中國古代思想研究般，並沒有意圖對過去被看作秦漢以後而沒受到足夠注意的文獻進行「平反」，或者對新出土文獻的作者或學派歸類的問題作出「解決」。<sup>30</sup> 若將如上

---

<sup>30</sup> 關於這一點，平勢隆郎剛出版的《「仁」の原議と古代の數理》（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6年）一書，探討從《史記》到《元史》的「仁」概念，並和先秦諸子著作中的「仁」字用例的涵義作比較，以釐析「仁」概念的原義。筆者所關注的是，平勢採用的研究手法疏離於1930年代以來「津田—栗田」脈絡的「觀念史」研究方法，而接近近年來臺灣學界推動的使用大型資料庫來抽出相關用例的研究手法。



所提及的《禮記·緇衣》問題作為例子的話，日本學者的學術興趣並不在於它的作者是否為公孫尼子或子思等問題，而是在於其思想對戰國中期儒家思想的展開中發揮何種思想功能的問題。這樣的態度也統貫於本專題所收錄的所有論文作者的問題意識。

鑑於此，下面筆者除已介紹的草野之外，將一一評述其他七篇論文的主要論點。首先，竹田健二的〈戰國時代的氣概念——以出土文獻為中心〉，在戰國楚簡資料中廣泛地尋求有關「氣」的用例，並且試圖論證儒道兩家對「氣」概念的各種論說在戰國早中期就已經開始展開。

接著，青山大介的〈戰國時代「明主」觀念探析——以「聖人」的對比為切入點〉，通過對戰國中後期所謂法家相關的典籍，如《商君書》、《管子》以及《韓非子》中「明主」和「聖人」用例之分析試圖論證，在戰國法家的論述中，「明主」和「聖人」二者之間具有「使役者＝君主＝上位」和「被使役者＝臣子＝下位」的職責分擔關係。從此可以推測戰國法家提出了一方面能夠防止「禪讓」或「篡奪」而產生的君權喪失；另一方面君主不需要他本人身為「聖人」直接負責治國的統治理論。

佐藤將之的〈戰國時期「忠」與「忠信」概念之展開：以「疑似血緣」、「對鬼神的『孝』」以及「潛在君德」為思想特點〉對過去研究將中國古代的「忠」概念一律看作「君德」的情形提出疑問。經過對《論語》、《孟子》、《禮記》、《大戴禮記》以及「郭店楚簡」相關用例的分析，指出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忠」和「忠信」概念之展開中可以觀察到（一）疑似血緣、（二）對於死者之「孝」，以及（三）潛在的「君德」等三種思想特點。據此作者主張，為了解「忠」概念在春秋戰國時代所展開的思想多樣性，學者需要以「君德」—「臣德」二分法之理解框架以外的脈絡來探討。

工藤卓司的〈西漢初期知識分子對「秦」的言論〉，注意到過去

針對西漢知識分子對於秦朝暴政批評的介紹中，大部分只不過是將相關論者的論述內容羅列而已。作者則進一步探討西漢知識分子的「反秦」論與他們的思想內容以及社會背景之間的關係。作者分析陸賈、賈誼、賈山、韓嬰、鼂錯及張釋之的相關言論，發現如下三點：第一，漢初知識分子雖同樣批評秦朝，但他們的切入點各有不同；第二，漢初知識分子批判秦朝時，在文字上雖看似在「評判歷史」，但他們的重點尚多在「評判現實政治」；以及第三，在賈誼與韓嬰的批評中可以觀察出受《管子》思想影響的可能。

橋本昭典的〈中國古代「情」觀念芻議——尋求「感情論」的所在〉則先指出過去對中國古代「情」概念的討論往往在所謂「感情論」的理解框架中展開，故此兩者應該要分開來進行各自的內容的探析。在此理解的基礎上，作者以「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中「道始於情」一句為切入點，分析戰國思想文獻中的相關用例，指出將「情」作為「人道」始源的「情」論應該無法按照當代語言所涵蓋的「感情」一詞來界定其主要內涵。作者也試圖論證這樣的「情」作為道德始源的思考在《論語》、《孟子》中也有跡可尋。

中村未來的〈作為統治手段之「恥」：以《逸周書》三訓為中心〉，主要以《逸周書》三訓（度訓、命訓、常訓）為切入點，試圖勾勒出戰國時代「恥」觀的演變。作者先概觀過去中日學者對「恥」概念研究的相關見解，接著分析《論語》或《孟子》中「恥」的相關用例，發現此兩書中的「恥」係促成內省或自我修養的要素。而對《管子》相關用例的分析，則發現《管子》將「恥」與「禮」、「義」並列，認為是治國的關鍵。這樣的思想也可在《荀子》將「廉恥」一詞與禮義、辭讓並列陳述中觀察到。至於《逸周書》三訓的「恥」，則是將「恥」與「禍」、「福」、「賞」、「罰」同作為治民之要，這樣的構思與如上《管子》的「恥」概念相類似。

菅本大二的〈先秦時期「天」概念之形成與展開——以主宰的「天」為中心〉，闡述從商周時代至戰國末年具主宰涵義的「天」概念

之展開。作者主要關切的問題如下：第一，「天」概念如何產生，究竟為何能夠成爲當時人類之主宰，如何在古代人的思想中落實等問題。菅本認爲，在青銅器銘文中看見的「主宰天」是對於人類的善行和惡行個別施以「福」和「禍」來對應的一種「因果律」。第二，《商君書》的「法」思想與主宰之「天」的關係。菅本發現，《商君書》的「法」思想並不依靠主宰之「天」的權威，由此推測這樣的「天」觀有可能是《荀子》「天人之分」論的來源之一。

此七篇的作者所導出的結論是否妥當，筆者暫不予以評論，希望由讀者自身來評斷。總之，一般而言，研究古代思想的日本學者基本上並不甚明確地意識到自己引進「觀念史」研究方法的情形。不過如上文所述，在過去七、八十年日本研究古代思想中，其實不少學者曾經採用（廣義的）「觀念史」研究的方法，而這樣的傳統則爲本專題的作者們之研究方法中或多或少所共有的。筆者鑑於日本「觀念史」研究的一種「獨自」展開的歷史本身以及當今情況，一直讓日本之外的中國古代思想研究者比較難以獲悉日本的相關研究情況，而籌劃了本專題的內容。

筆者和本專題的所有作者均衷心希望：本專題的刊行不但有助於中文學界對日本中國思想研究中「觀念史」研究方法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地理解，而且能夠促進中文學界對中國古代思想相關主題具體研究的學者和研究生更加關注「觀念史」方法。

筆者謹願讀者專家不吝賜教！